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主編

第四輯

文獻研究

學苑出版社

後張角之神符白刃控拳應韓林之妖讖勝廣本狐
成徒行將抵鹿曹充悉魚臺盜藪勢等連雞苟無鉅
之威奚免釜鬻之瀾公乃禁嚴左道柱砥中流扼南
之要衝作江淮之屏障遂聯長江互保之約卒挽中
垂危之機此公之功在一方者也洎乎辛壬之歲和
告成文忠疾革章遺疏以薦賢方孔明之舉向寵
而入衛比光武之代汾陽時則金輿西狩鐵艦
來受任於危難之餘收復於瘡痍之後公乃安內以
外除舊以布新戒亂風之十愆建擎天之一柱領首
為諸侯長叔新法為天下先遂使宮車安返畿輔宴
朝廷既倚若長城公裔亦羣欽司馬此公之功在大局
者也逮於玄黃變起蒼赤運移本舜禹為公之心成
召共和之局公知天下定必于一民生事乃在三將
參稽今古躋一世於熙隆必先統壹車書納斯民於
物而乃昊天不弔景命靡常國家興折棟之悲士民
拳髯之痛比者當飛鴻之首值亢龍之災紀綱墮而
守隳彝倫斁而典章缺火星星以燎原河滔滔其日
側望觚稜淒其風雨迴思勳烈邈若山河有不愴念
弓而興懷宿草者哉同人等或追隨部曲或瞻戀轍
跡潯水以傷神對峴山而雪涕咸以豐功未遠崇報
虛非所以妥英靈而昭賢也爰於天津河北拓地



文獻研究

学苑出版社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主编

第四辑



鹿耳門之捷此公之功在
 一之代汾陽時則金與西好鐵
 餘收復於唐之役公乃安內以
 風之天下先使官軍安返哉輔
 亦羣欽司馬此公之功在大
 足蒼赤運移平輝禹為公之心成
 下定必一民生事乃在三將
 隆必生統壹車書納斯民於
 常國家與并棟之悲士民
 龍之災紀綱墮而
 音火星星以
 其風戶恩動烈
 早者哉同人等
 對覲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研究. 第四辑/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主编.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077-4640-2

I. ①文… II. ①甘… III. ①文献学—文集 IV. ①G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0450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封面设计:五凉工作室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发 行: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第一新村81号

邮政编码:730030

网 址:www.ch5000.cn

电子信箱:wxyj2010@163.com

销售电话:0931-8124248 8124165

海外总经销: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销售电话:(010)-68433194 (8610)68415917(传真)

国内总经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本尺寸:889×1194 大1/16

印 张:8.5

字 数:173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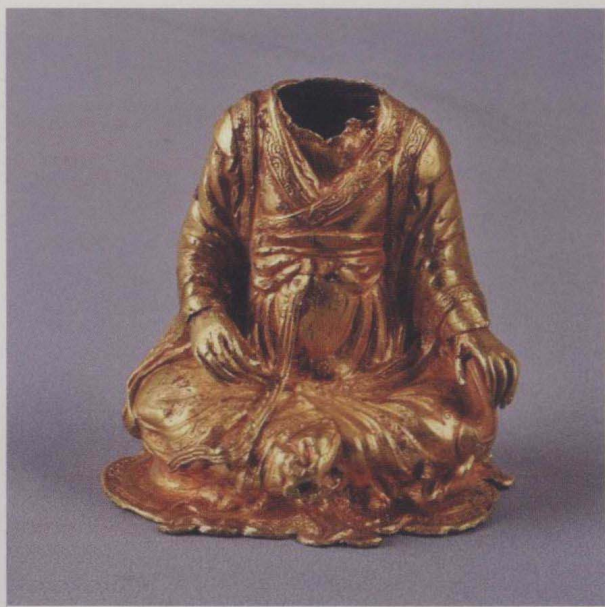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版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0.00元



西夏文物：金佛（背面）



西夏文物：金佛（正面）



西夏文物：金佛（侧面）



西夏文物：金佛（侧面）

编委会主任

励小捷

编委会副主任

张建昌 张瑞民 马成洋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卞利	杜建录	李华瑞
何双全	张志清	苗普生
苗德新	郑炳林	高国祥

主编

高国祥

特邀编辑

李民发

编辑

陈学泰 霍海珊

去伪存真 无征不信

陈育宁

从事中国古代问题研究，文献资料是基础。无论是传世文献资料也好，出土文献资料也好，研究者对其了解和掌握的丰富程度、理解与分析的准确程度，将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科学与否。而所利用的文献资料是否原始、可信、完整、丰富，也是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能否经得起时间与学术检验的关键。郭沫若在谈及古代文献资料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曾指出：

“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①开展规范、科学的整理研究工作，为学界提供丰富、可信的古代文献资料，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尤其显得重要。文献整理工作要大力倡导“去伪存真”，研究工作要大力倡导“无征不信”。

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具有物质载体与思想意识相统一的特点：“它既体现了特定时代、区域的文化心理构成，又可以对文化起储存、传递作用，同时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心理深层结构，参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民族性格的重铸。作为文化产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化的精神，积淀、凝聚着时代的文化，反映了民族的心理和时代精神。”^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古代文献记录了地区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沧桑巨变，反映了各民族的发展轨迹，其丰富深广的历史内涵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保护好、传承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利用，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影印出版技术为快速出版古代文献资料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人”在其中所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以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及辑佚、索引、汇编、影印等方式开展文献资料整理工作，并非什么人都可以胜任。“术业有专攻”。一定要以敬畏之心对待古代文献资料，它们不是谁都可以肆意摆弄的“玩偶”。

近些年来，国家日渐重视传统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中都强调，要重点支持对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有重大作用的古代文献典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国家在“十二五”期间，每年都批准一定数量的文化典籍档案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一些文化大省也启动了一批大型学术文化工程。西北地区的甘肃省依托建设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有利时机，启动《陇右文献》整理编纂出版工程。陕西省将《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列入陕西省“十二五”文化事业及产业发展规划，成为政府支持的重大文化工程。新疆自治区也于2010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疆少数民族文献与濒危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重大项目的开展固然有助于锻炼队伍、培养人才、集中展示学术成果，但某些项目开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项目成果片面追求“大而全”，以豪华的装帧风格和大部头、多册数来博得关注，把学术项目刻意打造成“形象工

①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载《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李修生主编：《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程”，却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学术质量问题，无形中产出了一批有害学术的文化垃圾。

开展重大文献资料整理研究项目，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首先要花时间去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资料摸底、目录编纂工作，摸清家底之后，还要通过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术方法，进行试验性整理，取得个案的整理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论证，取长补短，确保实施方案科学、规范、操作性强，然后再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而有些地方所谓“重大”文化典籍整理项目的开展则有悖基本的学术规律。从项目启动看，不管条件是否具备，盲目攀比、跟风，一哄而上，硬性上马，往往造成“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从项目内容看，过于贪大求全，一味追求要将一地的文献资料“一网打尽”，实则是“一厢情愿”。从项目整理研究方法看，简单照抄照搬，缺乏认真的鉴别、校勘和补正，以至于以讹传讹。从整理研究队伍看，阵容“豪华”，不乏知名专家、学者挂名加盟，又常常是以行政领导挂帅领衔，实际从事整理研究者却力量单薄，难以胜任。从整理研究成果看，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出版影印文献贪多求快，良莠不分，鱼目混珠，原始文献诸多的文字和内容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又人为新增出了问题，如影印所据版本差，出现漏页、错排等现象。匆忙间貌似推出了大部头的成果，实则不能嘉惠学林，这不仅是项目经费的极大浪费，更是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从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看，往往自说自话，动辄以“填补空白”、“重大”、“里程碑”等自诩。这种不良学风的蔓延，的确令人堪忧！

保护好、传承好珍贵的文献资料，深入挖掘其学术价值，汲取其学术营养，古为今用，说到底要有学术良知与学术良心，要“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与“研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而是互有交叉。局部“研究”为全面“整理”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持，全面“整理”为深入“研究”奠定系统的资料支撑。“去伪存真，无征不信”，这应该是慎重开展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前提。清代学者顾广圻曾倡导“刊落浮词，独求真解”（《与阮云台制府书》），其对古代文献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梁启超在谈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指出：“无论做那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①前辈先贤的这些真知灼见，已然是学界的共识。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首批获得推荐的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在整理、编校、印制等方面可以作为古代文献资料整理出版的标杆和范本。这些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它们在版本选择、整理方式和出版形式等方面原创性强，整理体例完善，整理方法科学，符合学术规范和古代文献资料整理出版规范，体现了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水平。

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近些年来致力于传统典籍的整理刊布工作，出版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等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不为利所诱，而为功所需，所做的工作值得称道。编辑《文献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为文献整理与研究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尤显眼光独到。该中心所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当珍贵的文化资源化身万千、嘉惠学林之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是对他们工作最好的肯定。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目录

◆ 历史文献研究

- | | | |
|----|---|------------|
| 1 | 宋代史学与《资治通鉴》 | 汪受宽 |
| 9 | 清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恽毓鼎致曾植信札的史料价值——
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讨 | 王冀青
漆子扬 |
| 21 | 甘肃历代《易》类古籍文献解题 | |

◆ 民族文献研究

- | | | |
|----|---------------------|---------|
| 29 | 大谷大学藏《猓猓译语》述略 | 聂鸿音 松川节 |
| 35 | 《保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的新思考 | 张九玲 |

◆ 考古文献研究

- | | | |
|----|-------------|-----|
| 39 | 读竹简札记四则 | 蔡 伟 |
| 43 | 西夏白银与交钞使用考述 | 牛达生 |

◆ 地方文献研究

- | | | |
|----|------------|-----|
| 53 | 关于新修地方志的思考 | 李正宇 |
|----|------------|-----|

◆ 文学文献研究

- | | | |
|----|--------------------------|-----|
| 57 | 《楚辞》校证（二十五则） | 王 伟 |
| 65 | 再谈《孔子家语》、《说苑》所收金人铭章的有关问题 | 邹可晶 |

◆ 特色学科研究

- | | | |
|-----|---------------------|------------|
| 83 | 霞浦摩尼教新文献《冥福请佛文》校录研究 | 杨富学 史亚军 包朗 |
| 99 | 故宫博物院图书流播韩国研究 | 傅德华 |
| 103 | 《白伞盖佛母总持启请偈》的西夏译本 | 段玉泉 |

◆ 新书推介

- | | | |
|-----|--|-----|
| 109 | 《西夏文物·内蒙古编》综述 | 塔 拉 |
| 119 | 居延汉简及其相关的人和事——
《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译者序） | 张德芳 |
| 127 | 《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前言 | 杜建录 |



◆ Ancient Materials

- 1 Song Historiography and Zizhi Tongjian Wang Shoukuan
- 9 Historiographic Value of Yun Yuding's Letter to Shen Zengzhi in October 5th, 1909: A Review of the Banquet for Paul Pelliot by Beijing Scholars Wang Jiqing
- 21 Catalogue of the Classics concerning Yi from the Gansu Corridor in Past Dynasties Qi Ziyang

◆ Ethnic Materials

- 29 Expounding on the Lolo Vocabulary collected in the Otani University Nie Hongyin, [Japan] Matsukawa Takashi
- 35 New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Loloish Classic Zuoji Xianyao Gongsheng Jing Zhang Jiuling

◆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 39 Four Notes on Bamboo Slips Cai Wei
- 43 An Investigation of Silver and Paper Cash Circulation in Xixia Niu Dasheng

◆ Local Records Materials

- 53 Reflection on New Local Chronicles Li Zhengyu

◆ Literature Materi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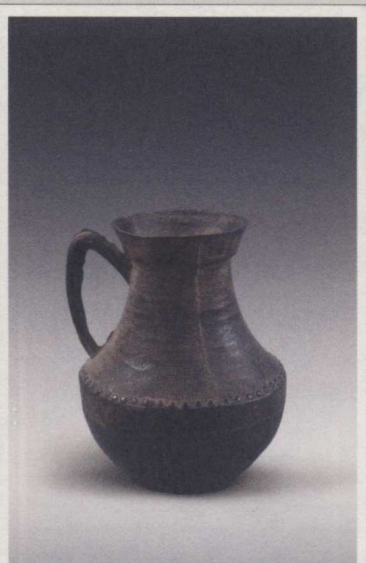
- 57 Twenty-five Collation Notes on Chuci Wang Wei
- 65 Review on the Inscription on Bronze Statue Recorded in Kongzi Jiayu and Shuoyuan Wu Kejing

◆ Special Subjects Materials

- 83 A Recently discovered Manichean manuscript Mingfu Qingfo Wen from Xiapu Yang Fuxue, Shi Yajun, Bao Lang
- 99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ook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alace Museum to Korea Fu Dehua
- 103 Tangut Version of the Initial G ā th ā to the Sit ā tapatra-dharan ī Duan Yuquan

◆ Book recommendation

- 109 Xixia culture relics volumed by Inner Monglia were reviewed Ta La
- 119 Ju-yan bamboo slips and related people and things—Archaeological report about EjiNaHe river basin of inner mongolia—Translator's words were reviewed Zhang Defang
- 127 Heishuicheng national writings and documents collected in china—preface were rivewed Du Jianlu



西夏文物：铁铸壶

宋代史学与《资治通鉴》

汪受宽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高峰时期,无论是史学思想,还是史学典籍都极其繁荣,“正史”的编写亦成为主流,而且史书体例大为丰富。同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乃属司马光,他编写的《资治通鉴》一书,在史学界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我国文化传承中的瑰宝,不仅是史书典籍的模范,而且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是封建社会最为推崇的政治教科书之一。

关键词: 宋史 司马光 《资治通鉴》

Abstract: In the Song era, as the peak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thought and records became extremely prosperous and, as the mainstream of official history, the style of historical records became plentiful. In the meantime there sprung up 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historians. Being a treasure in our cultural inheritance, *Zizhi Tongjian* compiled by Sima Guang,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historians at that tim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realm of historiography. It is not only a model for historical classics, but also one of the political readers being rewarded and respected in the feudal society from then on.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Song era; Sima Guang; *Zizhi Tongjian*

中国古代史学,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到宋代达到它的高峰。宋代史学途径宽广,气象博大,方法致密,不仅集前代史学之大成,也为后代封建史学所不及,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资治通鉴》则是宋代史学的一面旗帜。

一、史学思想、当代史、“正史”的繁荣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宋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宋太祖在大乱之后,为了防备军阀割据事件的重演,建立了绝对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并一反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重视文化,重用文人,而且以高官厚禄奖劝文人,这种政策为宋代史学的繁荣创造

了适宜的政治条件。宋朝历代帝王努力振兴文化,提倡史学,关心史书的撰述,对学术风气的形成和持续极为有益。宋代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印刷术的进步,对史学的繁荣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撰写史书必须凭借大量资料,以前人们读书都靠手抄,现在书籍大量印制,给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繁荣的宋代史学,在史学思想上为专制政权服务的政治性更为明显,这既表现在正统论的盛行上,也表现在专为帝王服务的几部大部头类书和《资治通鉴》的编撰上。

正统论源于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三国时正式用于争作合法政权的理论。南北朝时对史书的编撰有重要的影响,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即留辫子的野人)^①,北朝称南朝为“岛夷”(即住在水上的蛮子)^②。宋代外患不断,所以正统之论、华夷之别尤严。宋代正统论发端于欧阳修,到朱熹的《通鉴纲目》正式确立。朱熹认为,只有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王朝,才是正统。因此,自周至五代的1362年中,正统的只有周、秦、汉、晋、隋、唐6个朝代,其他都不是正统,而是僭国、篡贼或无统。其实,正统论是统治者用以欺骗人民的工具,从人民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统治压迫人民的,都不是人民的正统。但是封建社会的正统论,是封建大一统专制主义思想的体现,故而对宋朝及其以后史书的编纂有重要影响。

在宋初帝王都爱读书的影响下,当时学人都以多闻博记为上,为了有系统地阅读资料,给帝王提供统治术的教科书,宋太宗下令李昉等人为他编了《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宋真宗又令王钦若等人编成了《册府元龟》1000卷。这四部类书,被后人合称为宋朝四大类书。其中,《太平御览》以引证广博见称,所引古籍达2579种,现存者不过十分之

二三,是研究宋代以前历史和校勘辑佚古籍的宝库。《册府元龟》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编成,册府是典策渊藪的意思,元龟即大龟,是古代占卜所用的宝物,因为占卜可以预知未来,作为借鉴,所以称可以用作借鉴的事是龟鉴。命名之意是说这部书是君臣鉴戒的大书,可以作为将来的典范。该书专辑上古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所采事迹不仅包括《十七史》的绝大部分内容,还兼取唐、五代实录等,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和校史、补史、辑佚等都有重要价值,也为宋代人修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与此同时,私人编纂类书的风气也很盛行。著名的如:王应麟《玉海》,祝穆《事文类聚》,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高承《事物纪原》等。其中《玉海》200卷,分21部240类,多录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和吉祥的善事。书中不仅抄录材料,还多用提要概述的形式撮叙事实,并常常略作考证。该书包括了涉及文史的多方面知识,被古人称为“大有裨益经济实学”的“天下奇书”^③。

后来,学风发生变化,新派的学问是以《春秋》为榜样,贯通古今沿革当作借鉴,于是出现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名著。司马光在给宋英宗的奏疏中说明了编书的目的,是为帝王作历史的参考。他说:“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④所以,他要将历代有关国家的盛衰和关系人民切身利益,善良可以学习的,恶劣可以戒备的,帝王应该知道的史事,编

①《宋书》卷1《武帝本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页。

②《魏书》卷2《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页。

③清刻本《玉海》,胡助、熊本二序。

④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页。

成《资治通鉴》一书，供帝王阅读之用。

公私齐动手，大规模地进行当代史的编修和史料整理，是宋朝史学的一大特色。当代史的编修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魄力。宋朝政府建立了庞大而且健全的史官组织，设置专门史官，分别撰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当时，史官各有专职，分头记述。编修院（后改名史馆）负责修国史，起居院负责修起居注，日历所负责修日历，中书省和枢密院分别撰修时政记，实录院负责修实录。这些书的数量都很大，如日历达4102册，19个皇帝的实录达3833册。

宋朝的国史和实录允许人民传抄，而且朝廷对士大夫比较宽容，因此，宋代私人撰修本朝史的很多，其数量之多、卷帙之大，都是空前的。虽然其中有的因内容涉及社会现实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流传至今的仍很可观。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九朝史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的和战关系；陈均《宋九朝编年备要》，专记北宋九朝的史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专记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熊克《中兴小纪》，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专记宋高宗至宁宗的史事；佚名《宋季三朝政要》，专记宋理宗到宋灭亡的史事；王偁《东都事略》，北宋九朝纪传体史书等。此外，宋人的大量笔记、文集中，也记录当代史实成风，有不少珍贵的资料。

二十四史中，宋代撰修的有《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书》三部。《旧五代史》是由宰相薛居正监修，于开宝六年（973年）完成的五代纪传体史书，共150卷。该书仿《三国志》体例，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各自为书，各有纪传。《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所修，宋人多有非议，认为其

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于是，由宋祁、欧阳修主持，于嘉祐五年（1060年）修成《新唐书》225卷，该书与《旧唐书》比较，史事有所增加，而篇幅却有所减少。而且新书是用散文写成，取材生动丰富，又增加了表、志，反映了宋代正史编撰的新气象。《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撰。在编撰《新唐书》时，欧阳修认为薛史繁芜失实，便着手搜集五代史料，独自重新编撰，到皇祐五年（1053年）完稿。因为这是私人撰修的，故密藏于家，直到他死去5年后，家属才奉命奏上书稿，由国子监刊行。全书74卷，它改变五代各自为书的体例，打破朝代界限，按时间编排史事，以表示维护大一统之义。它仿效《春秋》笔法，注重于正名分，寓褒贬，书法谨严。它强调直笔记史，对史料进行了考订。它议论不苟，反复慨叹五代的黑暗，以反衬宋朝的太平。该书一出，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从中受到很大启发。

二、编年体通史和其他各种史体

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繁荣的里程碑。它的修撰，使编年史体达到绚烂美备的程度，影响所及，作者纷起。南宋时，袁枢在《通鉴》的基础上，写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不仅为人们阅读《通鉴》提供了方便条件，而且为史书的编纂开辟了新途径。自此以后，各朝纪事本末体史书陆续有人修撰，成为继纪传、编年以后的又一种贯通古今的系列历史著作。

政书是分门别类地记述典章文物沿革变迁的专书。通代政书始于唐杜佑的《通典》。宋代郑樵的《通志》是继《通典》以后的第二部通代政书巨著，该书有本纪、世家、年谱、列传及记典制的二十略。有人将其归为通史记传体。但其纪传部分多为抄撮旧史而成，二十略却颇为精粹，故一般将其归于政

书体。专详一朝一代各种典制的史书称会要。会要体虽创始于唐,但以宋人所著规模最大,体裁也最为完备。当时,首创由政府设官撰修会要,在秘书省设会要所,专司其事,前后成书10种,总数达2441卷。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宋会要文字,成500卷的《宋会要辑稿》,达800万字,其中十分之七八的史料都是《宋史》中所没有的,为今天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项制度沿革变迁的不可缺少的资料。同时,还有许多私人撰修的会要,如: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李攸《宋朝事实》,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此,会要便成为一种独具系统的断代典制体史书通行于世。

唐朝刘知几《史通》开史评风气,宋代史评继而勃兴,分为三支,各有专书。一支是以郑樵《通志总序》为代表的品评史学体例义法的著作,一支是以范祖禹《唐鉴》、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对史事的是非得失进行详尽论断的著作,一支是以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志疑》、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为代表的对历史事实的正误异同进行严密考定的著作。宋代的历史考证学使史评由注重书法疏于考证变为专书考证异同、批评史料选择,使历史著作所述史实更趋于真实,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金石学起源于宋代,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宋代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从而古代文物大批发现。宋代学者悉心对殷周礼器、石刻、泉布、汉简、陶器、石器进行搜集,整理鉴定,考释金石文字,并用来考定历史记载,称之为金石学。主要著作有: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遵《泉志》,龙大渊等《古玉图谱》,郑文

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等。

目录一名始于西汉末年刘向的《别录》。到宋代目录学成为一门显学,有辉煌的成就。一是宋仁宗时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人修成的《崇文总目》66卷,著录中秘藏书30669卷,每书都是先书名,次卷数,后撰人或注释者姓名、年代、官衔,并简略考证其存缺情况,是一部相当详备的目录书。二是郑樵《通志·艺文略》,创12分类法,特别是他提出书籍编类后不需加以不必要的注释,对后世目录书的编撰影响很大。三是开创学者私人编写一家收藏的图书目录,成为专书。著名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

校勘,古称校讎。五代社会混乱,书籍散失严重。宋初书籍不仅少,而且错讹较多。由于当时将《五经》、《三史》列于科举取士,需要有标准读本,更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大量书籍需要印制,于是宋代朝野都努力于经史的校勘、刊印。其中官校史书工程浩大,方法进步,选请专家从事工作。从太宗淳化年间到北宋末,先后由知名学者杜镐、陈尧佐、宋祁、曾巩、范祖禹等人精校刊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以后加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不算《旧唐书》)合称十七史。在校勘书籍的同时,宋人不仅写了许多校史专书,而且正式创立了校勘学理论。郑樵《通志·校讎略》就是我国第一部校讎学专著,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成熟期。它承先启后,所撰方志数量远远超过前代,编撰体例和内容也进一步完备起来,为以后方志的发展奠定了规模。首先是国家三次编撰全国地理总志。包括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总纂

的《太平寰宇记》200卷，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李宗谔等修撰的《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元丰八年（1085年）王存等修撰的《元丰九域志》10卷。其次，由于朝廷三令五申要求各地编修图经、图志，大大促进了地方志书的编修。《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著录的书籍共407部、5196卷，其中州郡志书约占十分之七八。这些方志书分门别类十分仔细，文辞也很雅赡。宋代方志中，最受历代史家推重的，是宋敏求的《长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等。

传记、学术史，大体包括名人年谱及其事迹的编撰，均为宋代创体。以年谱言，宋代有胡舜陟父子《孔子编年》5卷，赵子栎《杜工部（甫）年谱》2卷，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1卷，对后代影响很大。名人事迹编撰，最重要的有：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107卷。该书撰成于绍熙五年（1194年），收集了自建隆、乾德，迄南宋建炎、绍兴，大臣们的碑、铭、传、状，共著录碑传文254篇，不仅材料极其珍贵，而且开创了传记的新体例。再如佚名的《京口耆旧传》，则是采录镇江一地名人事迹的传记。

十七史自《后汉书》以后，有不少缺表、志。南宋初，熊方自题其书室为“补史堂”，以全力撰《补后汉书年表》10卷，开创了后代史家补作前史表、志的道路。其后有钱文子撰《补汉书兵志》等。

宋代史学的繁盛还表现在私人文集、野史、笔记的大量撰集及其内容的浩博上。宋人文集流传下来的很多，仅《四库全书》别集类著录的，就有388部5000余万字。宋人流传下来的笔记，《四库全书》中著录的有151部。其中，如司马光《涑水纪闻》16卷，沈括《梦溪笔谈》30卷，洪迈《容斋随笔》74卷，陆游《老学庵笔记》12卷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

三、不朽的史学丰碑《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他20岁为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由奉礼郎迁至天章阁待制并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升翰林学士。当时，正值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与其政见不同，是反对派的头领，受到排斥。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自请作外官，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宋神宗曾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坚决推辞不就。次年，王安石为相，司马光又自请改为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以后六任冗官，在洛阳15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写作。哲宗继位，政局发生变化，司马光当了6个月的宰相，于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一日逝世。

司马光自幼爱好历史，7岁读《左传》，就能给人讲解。其后，终生手不释卷，甚至不知饥渴寒暑。他非常博学，音乐、律历、天文、书法、数学都很精通，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他自幼家教很严。五六岁时，家中有一些新核桃，姐姐无法去其青皮走了，姐姐的婢女用热水将青皮脱掉。姐姐回来后，问他：“是谁将皮去掉的？”他回答：“是我自己。”他父亲正好在外边看见，大声训斥道：“小子怎能撒谎？”从此以后，司马光再也不敢说谎话。他做事踏实谨慎，一生中从来没有写过草字，全是一笔不苟的楷书。他的性格又很坚强。这些，对他终于编成《资治通鉴》大有好处。司马光在仁宗时就计划编这部大书，以后又得到英宗、神宗的大力支持，神宗不仅为该书赐名撰序，还将颖邸藏书2402卷送给他，又供给纸笔，允许他以书局自随。特别是他编撰该书时，正当王安石变法之时，他以政见不同而居闲职，得以有时间专心写作。总之，司马光既有抱负，又有能力，又得到皇帝强有力的支持，又有闲功夫。这就

是《资治通鉴》成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早在治平元年(1064年)以前,司马光就编成了一部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周世宗显德六年的大事年表及评论,名《历年图》,进呈给仁宗。在此基础上,他又仿《左传》体裁,撰写了一部起三家分晋至秦二世的编年体《通志》8卷,进呈英宗。英宗对该书十分赏识,于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命司马光设书局于崇文院,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并给予他自行选择助修人员和借阅龙图阁、天章阁和三馆秘阁书籍的方便。神宗即位之初,给该书赐名《资治通鉴》,赞扬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治平三年四月到元丰七年十一月(1066—1084年),历时19年,司马光终于修成了这部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包括1362年史事,共294卷的编年体巨著。书成两年以后,司马光未及看到该书刊出,就去世了。他在《进书表》中说:“臣今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①司马光为编成《资治通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资治通鉴》的成功,与司马光编书的三大助手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司马光的书局有主编,有协修,有书吏。刘恕、刘攽、范祖禹是三大协修。他们各有专长,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特别是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由县令被司马光看中,称他“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②,任为实际的全局副手,主要负责魏、晋至隋朝和五代十国,为编书费尽心力,年仅47岁,在书成7年以前就去世了。刘攽(1023—1089年),字贡父,是《后汉书》的专家,知识渊博,善作文章,与其父刘敞、侄刘奉世合称“三刘”。他主要负责两汉部分。范祖禹(1041—1098年),字梦得,一字淳甫,他追随司马光在洛阳15年,倾全力于编书,放弃

了升官的机会,为该书耗力最多,主要负责唐代部分。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从元丰元年(1078年)起,负责该书的文字检查工作,也做出了贡献。这些年龄差距达30来岁的人,和睦相处,各尽所长,互为补充,分工合作,协同奋战,终于完成了这部史书的写作。

《资治通鉴》的成功也得力于它有一套严密的编撰方法。其编写程序为三步:

第一步做丛目。就是由分修各人按照历史事件的年月日的顺序,列出标题,围绕标题将有关史料剪贴排列起来,叫做丛目。丛目要求尽可能详备。

第二步做长编。由分修各人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的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日和事迹互相抵触的地方,就加以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这样出来的东西,叫做长编,实际就是初稿。长编要求尽量详细,而不能太简略,以便做进一步修改。

第三步删成定稿。由司马光依据长编,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司马光一般是先对长编进行粗削,再作细删、改写。他对于全书的书法、体例以及史料的考订、文章的剪裁,甚至字句的锤炼,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使来源于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文笔的史料,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自成一家。例如,《唐纪》的长编原为600卷,司马光花了4年多时间,仔细删改,定为81卷。司马光死后,洛阳还有两间房子的《通鉴》残稿,其中多半是长编的底本。现在还存有一卷司马光手写的《通鉴》永昌元年的提纲,上面的字一笔一画,非常认真。

①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附录,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8页。

②《乞官刘恕一子札子》,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第53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400页。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万字，篇幅浩大。司马光考虑到该书一般人难以全部阅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修书的同时，围绕《资治通鉴》，编成了《通鉴目录》30卷。它与《资治通鉴》配合，既是《资治通鉴》的索引、目录、补充，又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一部浓缩的《资治通鉴》，一部多功能年表体例的简明中国古代政治通史。

同时，司马光还编成了30卷的《通鉴考异》，把对《资治通鉴》中所用史料的考证、鉴别汇编到了一起。《通鉴考异》考证鉴别史料的方法主要是博引典籍，予以分析取舍，实际考订中既有反证法，又有推历法、推理法、择优法、常识判断法等，特别是注重了用碑碣墓铭证史，开创了史书考异之路，还为后人储存了丰富的史料。

司马光还撰成了《通鉴举要历》80卷、《通鉴节文》60卷，都是《资治通鉴》的简本。又有《通鉴释例》1卷，记述修史凡例和与刘恕、范祖禹等人往来的书信，为后人研究《资治通鉴》提供了方便。

杰出的史学著作，来源于历史家优秀的史学思想。《资治通鉴》中反映的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主张据史直书，不取正闰之说。正统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司马光却不以为然，他说：“那些所谓正统的标准，都是偏颇的个人意见，不是大公的通论。”他认为：“只要没有统一九州的都不能说成是正统，而不在于其是否华夏天子。”他排除正统观的偏见，根据帝王功业写史，甚至对曹操这样一位当时被骂为奸臣的人，也予以了很高的评价。

(二) 反对神鬼怪异之说。司马光在开始编修《资治通鉴》时，就对助手们宣布，除了个别有警戒作用的以外，有关神鬼怪诞祥瑞的记载，一概不加采录。反之，书中却有许多揭露迷信虚妄的材料。他本人也从来不信迷信，曾经写过一篇《葬论》，现身说法，

驳斥阴阳家关于必须择地看风水葬先人的胡说。他也不信宗教，在书中说信佛教是“事胡神”，老庄之书是“矫诬之说，不近人情”。

(三) 注重治乱原因的探讨。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标出发，他注重从历史研究中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他提出治国之道在于用人唯贤，德才兼备，让官吏有职有权，不可猜忌功臣。他在书中反复赞扬那些持法公正、赏罚严明的君主，谴责乱行赏罚的帝王。强调要使法令行之有效，君臣上下执法如一，真正体现法令的权威，实行法治。

(四) 从根本上说，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从另一条战线与王安石做斗争。所以，书中特别强调维护纲常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认为礼治道德关系国家的安危。将帝王的意志看成是历史的主宰，说：“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①大讲历朝祖述祖宗之法的情况，而删削历代变法的事实。

《资治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仅有的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900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备极推崇。清人王鸣盛称：“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②究其特点，主要是：

(一) 采用了丰富的史料，将1362年的历史融会贯通，集于一书，将其中盘根错节的无数事件加以耙梳，年经事纬，条分缕析地写出来，而且吸收了纪传体写作上的一些优点，每遇重大事件，必交代其前因后果，同一史事的材料，不再分见多处，避免了一般编年史书材料零散不相连的弊病，开辟了编年史体的新纪元。使读者可以用较少的时间，全面系统地了解这很长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得到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

(二) 材料丰富，考证精详，是古代史书

①《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载《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第46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第355页。

②《十七史商榷》卷100。

中最信实的一部。据统计,该书参考引用了359种史籍,数千万字的材料,其中有半数左右的书早已失传。作者对这么多的材料进行了严谨的考异鉴别,往往一件事要根据三四资料写成,纠正了许多史书中的记载错误,故所述史事比较翔实可靠。而所创造的分三步成书和史事考异的方法,更影响了后代史学,许多史家运用其法写出了质量较高的史书。

(三) 作者致力于探讨社会治乱的原因,以给统治者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书中对历代政治事件、军事斗争、农民起义、民族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真切详尽的记录。书中敢于揭露历代统治者,包括帝王的罪恶,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本质,为我们今天

研究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四) 《资治通鉴》虽为集体官修,但经过司马光的精心总撰,全书风格一致,如出一人之手。书中文笔卓绝,行文生动优美,结构严谨,长于叙事,是历史文学的楷模。许多篇章段落,都可以作为一篇篇完美而生动的故事看,特别是书中对一些重大战役的描述,气势磅礴,周详完备,绘声绘色,脍炙人口。

《资治通鉴》问世,对史学界有很大的震动,除胡三省为之注释外,仿效该书体例作史者历代不断,袁枢和朱熹在此书基础上还创立了记事本末史体和纲目史体。《资治通鉴》不愧是古代史书的典范。